

无路可走 第一部分

平常听到与想到的一些东西

其一 下大棋

中央在下大棋吗？你可以说它在，也可以说它不在，在中央喊出“保持战略定力”之后，中央基本什么都没做，这是在下大棋，还是根本瘫痪了？我认为中央此时是因为下大棋而瘫痪了。中央的大棋是“反腐，打破房地产泡沫，整治资本无序扩张，以及产业升级和一带一路”。可以说，这就是自爆，现在看来，正是这个大棋引爆了地方经济危机，这是注定的。

是权力变现的**粗暴且不可持续**引出了改革，如果不改革，则经济将会加速崩溃



因此大棋很明显了：**反腐、整治资本无序扩张、打破房地产泡沫**。这些政策所反映的是中央在试图减缓粗暴的权力变现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竭泽而渔），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是根植于这个官僚系统中的，系统中的官僚的主要目标就是权力变现，这是促使他们发展经济的唯一原因，与此对抗就是与整个官僚体系对抗，最终会摧毁地方的能动性，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瘫痪。

而大棋中的供给端调整，例如产业升级与一带一路，则是试图开辟新的市场，为竭泽而渔的官僚系统续命，这毫无疑问会导致贸易摩擦，而且这样做所增加的收入是否能跟得上官僚体系的消耗也值得疑问。我们稍后详解权力变现的诞生与逻辑。

但如果只是表面上进行改革，却不触碰到政治改革，那么所谓的改革也无法解决真正的危机，可以下这样的定论：任何不试图根治权力变现问题的改革都无济于事，剧烈的危机终将爆发。但有趣的是，权力变现正是这个体系的固有特性，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消灭权力变现等于消灭自己。

此时我们发现，这个矛盾是内生于体系中的，而体系面对这个问题的最终选择是——不打算推进政治改革，那么毫无疑问，整个中国终将会被这个体系拽着一起灰飞烟灭。中央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瘫痪，**唯有加速**。

其二 权力变现

在有限的池子里，权力的变现是有限的。权力变现是从不受监督的权力中诞生的，越极权，越不受监督，权力变现越快。权力变现一定伴随着放权，变现得多快，放权就应该多快，如果不放权，经济就会因为过度消耗而陷入危机。



中国属于无底线的权力变现，这就好比一辆车，它的油耗及其巨大。放权的诉求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诉求，群众就是被燃烧的柴油，它们在这样的燃烧下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要求降低油耗，不然自己不能增长，甚至会被快速燃尽（详见资本论的再生产部分）。这样的无监督的系统造成了很恶劣的后果，因为地方的权力变现是如此疯狂，企业也只好将这样的疯狂指向底层，整个国家都想的是如何最好地利用、变现与压榨更弱者，因此中国实际上只有迅速变现的逻辑，而没有长期投资的逻辑。部分企业出海时的优势就在于这一套压榨的方法上，但明显会遭至反弹，国外和国内不应该用同样的套路。

中国建国时是极权，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体系在50年代开始主张权力变现，刘少奇主张要中央放权，将生产指标下放到地方，推动地方的生产积极性，中央同意了这样的做法，随后导致了60年代的饥荒。毛将饥荒的发生视为地方走资本主义错误路线的后果，于是在60年代后期主导了文化大革命以重新集权，之后地方就丧失了发展经济的欲望。这次权力变现诱发的自我毁灭导致中国经济在1977年时接近崩溃。

第二次权力变现从1979年开始，它在政治方面做了一个巨大让步，就是放开农业的限制，也放开了部分政治诉求的表达。这一次改革重新将生产指标下放到了地方，于是地方迅速开始了权力变现。这很快就导致了巨大的腐败，80年代官倒层出不穷，中国面临着一波又一波酷烈的通胀潮，民生经济十分糟糕，经济问题诱发了80年代后期不断扩大的学生运动以及民运，这些运动试图逼迫中央进行政治改革，主张进一步将权力从地方下放到群众以遏制经济问题。巨大的放权压力导致官僚体系的反弹，随后以1989的天安门事件作为结局，将权力从地方下放到群众的努力终告失败。此后十年，中国经济在地方与中央的权力拉扯中迅速崩溃，在入世前夕，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行将灭亡的边缘。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唯一一次中国得到救赎，它给予了中国人全世界作为鱼塘，官僚系统得以继续竭泽而渔。此后十年的发展再次伴随着巨大的腐败而来，这一次的工具也包括大名鼎鼎的房地产。在2015年左右，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权力的变现一直伴随着部分放权，民营经济因放权得以发展，但也因为权力变现的竭泽而渔而苦不堪言。民间有大量的放权诉求，这种诉求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要求中央给予回答。但不出意外地，放权的诉求再次被官僚体系压制，而竭泽而渔也已经继续不下去。官僚体系甚至使用了2015年的棚改货币化这样极端的手段来续命，这一次再没有人会来救赎中国。

回顾历史，几乎没有一次官僚体系会在关键时刻选择放权，而是反过来更加集权，唯一的例外是在1979年时，这次例外的根源在于之前集权的极端，之后有8人共同掌权，在权力平衡下得以放权。但我们不应该期望这一次还有这样的8人能够主张放权了。

其三 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前车之鉴

80年代，地方建设积极性高涨，这同样是出于权力变现的需求，但地方并不知道建设什么，于是出现了大量的重复、低效、甚至无效的工业产能建设——这就是地方建立的各种国企。这些建设耗资巨大，地方没有资金，只有两个办法，其一是向银行借款，其次就是由中央发行大规模的国债后转拨资金给地方。这时候，国债直接由央行认购，这就构成了无锚印钞，后果就是一波接一波的通胀潮，通胀潮有三波，一直持续到1995年为止。在地方借的这些钱中，向银行借款的部分则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三角债，这些债务在199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使得银行坏账率飞速上升，银行接近破产。90年代末，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接近崩溃的经济体，银行坏账开始导致连锁反应，银行甚至只存不取。滔天的通胀已经让社会几近崩溃，社会治安差到出门都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期，70、80后记忆犹新的严打政策（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文革后）出台，旨在压制社会崩溃的势头。朱镕基在此时推行了大量政策，主要分为“开源”和“节流”两大类。在节流上，他禁止了央行再直接买入国债，无锚印钞被终止，他还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留作“后续处理”。朱镕基还主导了去产能的政策，包括著名的国企下岗潮，大量的国有企业被破产清算或转卖给私人，这一政策被指责为削弱底层消费力。大下岗后居民收入下滑，储蓄增加，消费增长停滞，必需品价格高企，大宗消费品供给过剩，一系列现象的叠加逐渐将中国推向了滞胀的深渊。在开源上，他主导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这被指责为富中央穷地方，这样的政策给底层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分税制改革政策与之前限制大规模投资的节流政策一起推行后，地方的能动性事实上已经被摧毁，税收压力迅速转向农村农业税，后果就是基层组织被严重破坏。1998年的医疗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更是吃绝户的政策，中国眼看着就要陷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这一事件拯救了中国经济。

总结来看，80、90年代的三次通胀表面上是所谓快速推进工业现代化导致的，但本质上是盲目无底线的权力变现导致的。地方在大规模投资建设时并不考虑需求端，而是盲目借款建设重复低效的工业产能，地方本没有资金，资金只能通过从底层人民手里“借”来，这体现为央行无锚印钞导致的通胀以及各银行（以存款为锚）的天量三角债。

在90年代末期，朱镕基面临这样糟糕的经济局面，只能选择继续降低福利待遇，然后通过地方国企的破产清算去除掉重复低效的产能。他在金融上选择大力加强中央的控制力度——例如通过分税制改革来控制地方行为。他还规范了银行的金融行为，他甚至不惜代价暂停地方投资来企图制止经济的进一步崩溃。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看起来更偏向于计划经济那样的指令式。虽然从糟糕的经济形势来看，这种“强控制”的做法情有可原，但它仍然不起太大作用。由于中央加强了经济上的控制，地方的积极性几

乎被摧毁，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丧失，但权力变现还没有完全停止。受到经济增长链条几乎停滞的影响，底层收入下滑，但底层同时又要继续受到权力变现的压力，这让底层苦不堪言。社会治安在这个时期变得很差，似乎经济问题的深渊就要将中国吞没。

朱镕基的手段其实只能稍微延缓经济的崩溃，如果没有加入WTO后外需的救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拯救中国经济，今人将他视为有功，只是因为他运气实在太好。

在整个80、90年代，直到后来新世纪，有大量的地方官员和部分家族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他们从来拒绝公开，拒绝给底层放权，这无不反应出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只是无底线的权力变现的一个伪装。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比80、90年代更好，反而更差，因为中国已经改无可改。在90年代的改革后，中国人不是低福利，而是几乎无福利无保障，政府再也没有包袱可以甩了。没有另外一个WTO会来拯救中国经济，中国劳动人口也早不如90年代那样年轻，政府债务的压力和人口结构的压力一起压在中国经济之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经济危机，情况毫无可能比90年代更好。

其四 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既然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的元素，就是承认了其“人定胜天”的机械式计划经济无法应对现实世界的混乱



这是很著名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斯大林式苏联和毛时期的中国来看，完全的计划经济旨在“对机器下令”，只注重生产，从生产出发，完全忽视需求。

很明显，真正面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是底层群众，而不是机器，虽然机器听指令，但它无法在混乱的现实世界中“生存”。因此，这种计划经济是完全失败的。

直到今天，中国依然被这种计划经济思想荼毒，中国的经济政策从来都在调整生产端，对需求端很少注意，因此中国经常出现“低效无效”的产能，因为它不在意需求端，在“它”眼中的需求端总是“听它指挥”与“理想”的，因此产能总是有效。

中央终究承认了要遵循客观规律。但是脱离现实世界的高高在上的官员依旧在那里衣食无忧，他们对下面发号施令， just 却不关心现实，只有权力变现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下层无人能够约束他们。这样的结构完全与市场经济相冲突，也无外乎中国一直不停地遇到危机与放权诉求，我们决不认为中国经济还能像网

上说的那样，仅仅凭借政府的一双大手就能安然度过这一次危机。因为从经济数据上来看，中国现在确实受到了现实世界与客观规律的巨大压力，底层再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自然规律正通过市场经济中底层所造就的经济数据狠狠给官员们扇巴掌，这一次官员们不能再人定胜天了。